

《四库全书总目·艺术类》的文献价值与中国艺术学话语体系建构

王希羽

摘要:《四库全书总目》中的“子部·艺术类”是《总目》著录艺术文献最为集中之处,包含书画、琴谱、篆刻、杂技四小类,其文献收录和提要撰写体现出四库馆臣重古书、重实用价值、重考证价值的著录特点。将其纳入当今艺术学研究中,不仅能厘清艺术文献的归类,认识艺术观念的演变,拓宽艺术研究中的古代文献视野,亦能揭示中国艺术的发展规律、发展路径和发展模式,对批判继承、丰富发展传统艺术学思想,构建中国艺术学话语体系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四库全书总目·艺术类》;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国艺术学话语体系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5)12-0148-06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中国传统目录学的重要职能。《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作为中国目录书的集大成者,不仅继承并发展了传统目录学的分类方法,更站在学术史的高度,通过对总叙、小序和各书籍提要的撰写,对学术源流、学术发展和学术演变进行了全面且精炼的总结,体现了《总目》对传统学术体系的基本构建和学术思想。虽然《总目》认为经、史之学才是学术之根本,子学可谓“杂学”,其中的“艺术类”更是“小道”,不过“凡能自名一家者,必有一节之足以自立,即其不合于圣人者,存之亦可为鉴戒”,“游艺亦学问之余事,一技入神,器或寓道”^[1],小道亦可观,《总目》仍收录了大量艺术文献,其对艺术文献的分类、取舍与评鹭,暗藏着中国传统艺术的价值取向与话语逻辑,为当代中国艺术学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了重要的文献基础与思想借鉴。

“四部”之中,“子部·艺术类”是艺术文献最为集中之处,而其他部类同样分散着没有冠以“艺术”之名却属于今天艺术研究范畴的艺术文献。因此,将《总目》纳入艺术学的研究中,不仅有助于厘清艺术文献在古代文献整理和归类中的分类情况,认识

中国古代艺术观念的演变,拓宽当今艺术研究中的古代文献视野,更能从传统学术体系中发掘艺术话语的本土基因,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背景下的艺术学学科建设提供历史参照与路径启示,是构建中国传统文化与历史语境中艺术学体系的重要文献支撑。虽然学界对《总目》的研究已成为一门显学,但对《总目·艺术类》的关注和探讨却较少,特别是对其艺术观念、价值内涵及其与中国艺术学话语体系建构的内在关联研究仍比较薄弱^①,这与当前推动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学术诉求存在明显衔接缺口。有鉴于此,笔者对《总目·艺术类》的文献著录特点详作梳理,深入挖掘其蕴含的传统艺术话语特质,以分析其在艺术研究中的意义,及其为当代中国艺术学话语体系、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供的本土资源与实践价值。

一、《四库全书总目·艺术类》 文献著录特点

艺术类书籍在我国古代典籍中属于较为特殊的一类,因其涵盖面甚广,如琴棋书画、金石篆刻、弓经

收稿日期:2025-10-15

作者简介:王希羽,女,四川师范大学巴蜀书画美育研究中心研究员(四川成都 610066)。

射法、香谱茶录、百戏算数等,都曾归入到“艺术”一类中,或曰方技,或曰术艺,或曰杂艺。在目录书中真正以“艺术类”命名始于北宋时期的《崇文总目》,其涵盖的范围亦十分庞杂。而《总目》将“艺术类”归于“子部”,下设四小类,分别为书画、琴谱、篆刻、杂技,艺术的内容由此被缩减了许多。从“子部·艺术类”“小序”中可以看出,《总目》的艺术分类是一个实用意义逐渐淡化的过程,愈发突出“艺术”的“技巧”性,即作为“小道”成为文人士大夫学问之余可娱乐、鉴赏、养心的对象。

《总目·艺术类》所列共三卷,其中两卷正目,一卷存目。前两卷正目收录书画之属七十一部,一千零六十六卷;琴谱之属四部,二十九卷;篆刻之属二部,九卷;杂技之属四部,四卷。第三卷存目收录书画之属五十二部,二百二十三卷;琴谱之属十二部,四十九卷(内一部无卷数);篆刻之属五部,二十四卷;杂技之属十一部,四十八卷。可见书画之属占“艺术类”主体地位,是当之无愧的“艺事之首”。从《总目·艺术类》对各朝代的文献收录情况来看,艺术文献数量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到宋代逐渐增多,宋代成为一个艺术著作发展的小高峰,至明清时期又再度迎来一次发展高潮。但总体来说,元代及元以前的艺术文献被著录者居多,而明清时期尤其是明代的艺术文献则大量被列入存目^②。就“艺术类”著作而言,虽然小序或案语中并未明确说明著录和存目之标准,但结合《总目·凡例》和“艺术类”各书籍提要,可以看出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重古书

从文献数量上看,魏晋南北朝和唐宋时期的著作著录比例远高于“艺术类”整体著录比例,且相较于明、清两朝著录比例更甚。“别集类”小序曰:“今于元代以前,凡论定诸编,多加甄录。有明以后,篇章弥富,则删薙弥严。非曰沿袭恒情,贵远贱近,盖阅时未久,珠砾并存,去取之间,尤不敢不慎云尔。”^[2]可见“宽于元以前,严于明以后”是《总目》收书和著录的总体原则,“艺术类”书籍的著录也同样遵循这一原则,体现出“重古书”的特点。《总目·凡例》曰:“《七略》所著古书,即多依托,班固《汉书·艺文志》注可覆案也。迁流泊于明季,讹妄弥增,鱼目混珠,猝难究诘。今一一详核,并斥而存目,兼辨证其非。”^[3]³³可见《总目》对待伪书的态度是贬低的,从其整体著录原则来看,大部分伪书都被列入存目。但对于其中流传已久、“历代词人已引为故实”的“古伪书”,《总目》在古书和伪书的权重

中更倾向于仍著录古书,因此,在“艺术类”著录书籍中,特别是宋以前著录的十四部书籍中,就包含《续画品》《墨薮》《画山水赋》三部伪书。虽考证均为后人依托之作,但作伪时期应与依托时代相距尚不远,且这几部伪书或“出以俚词,气体雅俊”^[4]¹⁴⁸⁰,或“相传既久,其论亦颇有可采”^[4]¹⁴⁸⁴,仍被收入著录部分,这与《总目·凡例》所叙对待“古伪书”的态度是一致的。

而对待其他伪书的态度则明显不同,如存目部分所列《续画品录》“旧本题唐李嗣真撰”,《总目》考证其“恐嗣真原本已佚,明人剽姚最之书,稍为附益,伪托于嗣真耳”^[5]¹⁵¹⁰。《画学秘诀》提要称“明焦竑《经籍志》始著于录,盖亦近代依托也”^[5]¹⁵¹¹。又《山水诀》提要曰:“大抵庸俗画工有是口诀,辗转相传,互有损益,随意伪题古人耳。”^[5]¹⁵¹¹这些伪书皆不属于“古伪书”范畴,故列存目。

(二)重实用价值

既然是官学背景下的书籍著录,择取有益教化、宣扬道义的著作自是首要标准,在“艺术类”书籍的收录上,《总目》十分重视其实用价值,尤其看重采摭繁复之书。如评价张彦远《法书要录》称“其书采摭繁富,汉以来佚文绪论,多赖以存,即李嗣真《后书品》、张怀瓘《书断》、窦冀《述书赋》,各有别本者,实亦于此书录出”^[4]¹⁴⁸²。又褒扬《历代名画记》“故是书所见闻,极为赅备”,“书中征引繁复,佚文旧事,往往而存”^[4]¹⁴⁸³。评《图画见闻志》曰:“就其所载论之,一百五六十年中,名人艺士,流派本末,颇称赅备,实视刘道醇《画评》为详,未可以偶漏数人而嗤之。”^[4]¹⁴⁸⁶诸如此类的褒奖还有很多,就不再赘述。反观“艺术类”中列为存目之书,如《书法钩玄》系“略具梗概,未为该备,其去取亦未精审”^[5]¹⁵¹²,《字学新书摘抄》“简略殊甚”^[5]¹⁵¹²,《明书画史》则“每人寥寥数言,不备本末,粗具梗概而已”^[5]¹⁵¹³,皆因论述太过简略、采辑内容面狭窄、体例不完备等原因,不具有实用价值,故列于存目。

(三)重考证

在清代考据学兴盛的学术背景下,《总目》收书亦遵循“今所录者,率以考证精核,论辨明确为主”^[3]³³的著录原则,虽然《书法离钩》提要有言:“学问各有门径,不必以考证之学责诸艺术也”^[6]¹⁴⁹⁹,但这并不意味着考证在“艺术类”著录中无足轻重。“艺术类”著作的著录与批评在兼顾艺术审视的同时,仍将考证作为其评价标准之一。馆臣希望收录的“艺术类”著作可以训诂名物,对考

证源流和辨别真伪的著作多持赞赏态度。如《总目》称《历代名画记》“非但鉴别之精,其资考证者亦不少矣”^[4]¹⁴⁸³。谓《宋朝名画评》“其所叙诸人事实,词虽简略,亦多有足资考核者焉”^[4]¹⁴⁸⁵。尤其盛赞《佩文斋书画谱》:“引据详赅,义例精密,抑亦考证之资粮,著作之轨范也。”^[6]¹⁵⁰²除此之外,还给更多著作以“足资考核”“足以资考证”“考核至诚”等较高评价。而仅列存目者,往往“失考甚矣”^[5]¹⁵¹¹,“无一字之考证”^[5]¹⁵¹³,“无裨考证”^[5]¹⁵¹⁷,这都是“艺术类”著录重考证的体现。

二、《四库全书总目·艺术类》 在中国传统艺术研究中的价值

(一)厘清艺术文献归类,认识艺术观念演变

前代史志和官私目录书大多记载书名,而对类目的设置没有太多说明,《总目》则提供了充足的信息,包含着《总目》以及清代官学的学术体系和价值判断,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统治者及馆臣对于传统学术结构、学术发展、学术特征的把握和认识。而艺术作为其学术构架的一部分,《总目》对艺术文献的整理和归类,亦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古代艺术内涵的起源、变迁,宏观审视清代艺术思想的发轫、嬗变。

古代“艺术”内容涉及面很广,艺术书籍在古代典籍当中也相对特殊,无论是类别的变迁还是内容的分合都表现得较为复杂。《总目》将“艺术类”归于“子部”,分书画、琴谱、篆刻、杂技四项,也只是代表清代艺术观念或是古代“艺术”发展至清代中期时内涵的基本定型,是某一时代的反映,并不能囊括古代“艺术”内容的全貌。但以《总目》为基础,按照由近及古的顺序进行历代艺术类内容的比较和发展路径推演,古人艺术观念的流变之因缘便清晰可见。我们知道,“艺术类”的文献内容以书法、绘画著述最为固定,并且从前代目录书到《总目》的书画著录数量看,也是呈上升趋势的,这与我国传统艺术最尚书画不无联系。而且书画类专科目录的出现也比官私、史志目录中“艺术类”的出现更早,因此到《总目》形成以书画为主体的艺术观念是势所必然。不过,《总目》对琴谱的划分却并非古已有之。如《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通志·艺文略》等书,都是将所有音乐书籍收录于“经部乐类”,并没有对琴谱和乐律书籍作严格区分。大约至《遂初堂书目》《直斋书录解題》开始,才逐渐将琴谱类著作转向子部,到《总目》言“琴本雅音,旧列乐部”,“均退列艺术,

于义差允”,即出现了对音乐著述的“雅郑”之偏见,特别是《总目》“经部·乐类”中其实仍保留了几种琴谱书,将归类“艺术”的音乐文献与归类“乐类”的音乐文献,以有无政教实用价值为标准作了明确划分。再看棋类著述,《隋书》因“智角胜负,古兵法之遗也”^[5]¹⁵²⁴,在“子部·兵类”中收录围棋十一种、弹棋一种,以及投壶、博塞、象经等数种,但随着棋类的应用与兵法日益渐远,《旧唐志》以下皆把棋类置于“艺术类”中,不再作较大变动,《总目》亦称“置于谱博弈、论歌舞,品名纷繁,事皆琐屑,亦并为一类,统曰‘杂技’焉”。与棋类同理的还有射法弓诀一类。《总目》曰:“射法《汉志》入兵家,《文献通考》则入杂技艺,今从之。”^[5]¹⁵²⁴虽射法入“杂技艺”并非始于《文献通考》,《新唐志》“杂艺术类”就已纳入射法弓经,但总的来说,射法类目的变化,应与唐宋时期火器技术进步,传统的弓弩类武器在军事领域逐渐失去实用价值而转型至娱乐领域有关。

以上射、御、乐、书都是一步步从实用技能教育发展至艺术娱乐领域,足见“艺术类”的发展,实际上是一个实用色彩逐渐淡化的过程,到《总目》这里,人们对艺术的价值取向便越来越靠近鉴赏、养心的“学问之余事”了。如此对类目的层层离析,不仅是为了书籍排列的有序,更旨在明晰雅俗之分、厘定学术秩序。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实现了对艺术的合理归类,更进一步推动了艺术史和交叉学科关系的梳理与总结。

(二)拓宽传统艺术研究中的文献视野

《总目》收录的艺术文献并不仅局限于“子部·艺术类”。据统计,单是与绘画相关的著作,“艺术类”收录四十六种,“杂家类”收录四十余种,“小说类”收录二十余种^[7],还有前面提到的集部“别集类”中,同样存在大量题画诗、词、跋,对今天的美术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再如,《总目》将“史部”分为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传记、目录等十五类。由于中国传统艺术家的身份多样性,其中“正史类”除了记载重大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活动、科技创造外,也囊括了文学艺术之流变、文化典籍之传承等,对艺术史的研究起着辅助和补充作用。“传记类”是艺术家生平和艺术思想比较集中的地方。“目录类”中的金石著述不仅属于书画传统艺术领域,还与工艺甚至音乐艺术有一定关联。“目录类”小序云:“金石之文,隋、唐《志》附小学,《宋志》乃赋‘目录’。今用《宋志》之例,并列此门,而别为子目,不使与经籍相淆焉。”^[8]可知金石一类在前代目录分

类中,与书法一样归属于“经部·小学”。“目录类”经籍之属案语曰:“《隋志》以下,皆以法书、名画列入目录。今书画列于子部艺术类。惟记载金石者无类可归,仍入目录,然别为子目,不与经籍相参。盖目录皆为经籍作,金石其附庸也。”^{[9]1136}“目录类”金石之属案语曰:“今以集录古刻条列明目者,从《宋志》入目录。其《博古图》之类,因器具而及款识者,别入谱录。石鼓文音释之类,从《隋志》别入小学;《兰亭考》《石经考》之类,但征故实,非考文字,则仍隶此门,俾从类焉。”^{[9]1151}从以上分类说明可看出,“目录类”的初衷本是对经籍的整理,将金石类文献归入其中实际上是《总目》分类时的权宜考量,如此,金石也成为经籍之附庸。

清初以来,众多考据学者均以金石资料与经史研究旁参互证,这一分类方法实际上也是清代学术风气的体现。梁启超曾指出,各类器物上文字所记载的事迹远超出经所限,为后世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材料,“而其花文雕镂之研究,亦为美术史上可宝之资”^[10],这是对金石审美价值的肯定,其实四库馆臣对此也不无认识。如“目录类”存目著述中,曹溶撰《金石表》提要曰:“王羲之书《曹娥碑》《乐毅论》诸条下,皆注宋拓字。是杂录古帖,并非金石之存于今者矣。”^{[11]1159}陈奕禧《金石遗闻录》提要曰:“是书为书法而作,就所得金石,采录其文,汇辑成帙。”^{[11]1160}此类提要明确提到其主要内容是围绕书法展开,然内容兼及金石,馆臣便仍将其归于“目录类”而非“艺术类”,可知其分类依据与“史部·目录类”在学术上的地位高于“子部·艺术类”有关。

此外,“子部”著录中除前面分析过的“谱录类”“杂家类”“小说家类”外,也还有一些零散的诸子言论,同样属于珍贵的艺术文献。如孔子的“礼教”思想就常与音乐艺术结合,他曾以“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12]116},对音乐艺术的社会功用做了高度概括。《庄子》《荀子》《韩非子》等亦有与绘画相关的言论或寓言故事,包含着深刻的艺术见解^③。尽管诸子言论并非谈论艺术,但却蕴含着丰富的艺术内涵,对艺术美学、艺术哲学等领域的研究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如此,《总目》在艺术研究中便不只是方便文献查阅的目录书,更能拓宽我们在艺术研究中的古代文献视野,除了聚焦“艺术类”之外,还应广泛涉猎经、史、子、集各部文献。

(三) 为传统艺术史研究提供重要依据

《四库全书》收录的许多“艺术类”文献都存在著作失传、章节残缺、编著者信息不明或真伪难辨等

问题,馆臣将搜访而来的书籍进行了全面辑佚、辨伪、校勘、订误,为艺术史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总目》所撰各书籍的提要内容正是体现了这一整理和考辨的大工程。

如《宝真斋法书赞》提要曰:“所载诸帖,石刻流传者十仅二三,墨迹仅存者百鲜一二,皆因珂之汇集以传,其书泯没零落逾数百年,遭遇圣代右文,得邀哀辑,复见于世,可谓珂之大幸,亦可谓历代书家之大幸矣。”^{[4]1492}此书内容的丰富,自然也加大了辑佚工作的难度。《总目》则采用“排比推求,以类分编”的方法,使鲜有流传的石刻法帖又复见于世,“谓历代书家之大幸”的评价亦为中肯。又如《续画品录》提要曰:“嗣真唐人,而称梁元帝为湘东殿下,仍同姚最之文。其序又云,今之所载,并谢赫之所遗,转不及最一字。”“《法书要录》载嗣真《后书品》一卷,各有叙录,又有评有赞,条理秩然。计其《画品》体例,亦必一律,不应草草如此。是尤作伪之明证矣。”^{[5]1510}《总目》在收录著述时如遇作者归属存疑的著作,会在其提要之首增“旧本题”三字,继而参照作者相关著作的体例,依据内容的自相矛盾处,或是依照馆臣的常识进行真伪的判断,《续画品录》的辨伪方法即属前者。在“艺术类”书籍中,《总目》考其为伪作的著作还有《画山水赋》《山水松石格》《后画录》《画学秘诀》《画山水诀》《画禅》等,辨伪成果可谓显著。再如,《总目》在《寓意编》中订正了其干支纪年信息的错误^④,曰:“惟成化戊申一段,成化实无戊申,殊为牴牾。”^{[6]1496}又考证前代载《法书通释》的卷数有误,称《静志居诗话》说张绅工大小篆,“撰《法书通释》一卷”,“今检此本,实为两卷,盖朱彝尊偶误记也”^{[5]1513}。

《总目》的编撰可谓贯彻了清代朴学的治学精神,对艺术著作进行了文献层面的全方位考证,虽也有个别推论存在主观、武断之疑,但也可警示后人学术论证需更加理性客观、谨慎严密,补足了以往目录书的编撰缺陷。这也是如今开展艺术研究的基础工作和前提条件,艺术史研究的真实性依赖于艺术文献的可靠性,客观真实的艺术文献能为鉴别艺术作品的真伪提供有力支撑。

三、《四库全书总目·艺术类》对中国艺术学话语体系构建的意义与价值

此前,中国艺术学的基本模式和基本框架是建立在西方哲学艺术理论基础之上的。甚至在向西方

学习的社会思潮中,由于西方艺术理论和艺术观念的引入,中国传统艺术学逐渐被边缘化,而西方哲学、艺术理论等在中国广泛传播,西方的哲学艺术观点、术语和方法已然成为中国艺术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参照和依据,在其理论体系的发展过程中,均未曾研究过中国的传统艺术。“这一现象本身就是奇怪的和具有潜在危机的。”^[13]在不断译介、追赶西方艺术学的过程中,我们更多扮演着搬运工的角色,却并无多少自己的研究成果和艺术创作,反而中断甚至遗忘了中国艺术学自身的特点,使得中国特色的艺术学及其话语体系长期处于失语状态。这是当代中国艺术学发展中值得我们深刻反省的经验和教训。不是不能借鉴西方的艺术理论,但借鉴不是全盘接受和代替。张道一先生曾说:“对于西方文化和在学科建设上,参考和借鉴是必须的,但不能以西方为准绳,用来‘匡正’自己。”^[14]正因如此,当今艺术学的发展始终强调要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要以解决中国艺术问题、阐释中国艺术创作、揭示中国艺术规律为根本目的,扎根于本民族的文化土壤,才能成为世界文化的共享资源。这就要求当代中国艺术学的发展,要立足于中国传统美学思想、文艺理论以及传统艺术学的深厚底蕴,这是中国当代艺术学彰显中国特色和文化遗产的关键所在。

虽然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艺术在发展过程中并未形成现代意义上的艺术学学科体系,中国传统美学、文艺思想也没有像西方那样建构成结构完整、层次分明的学术体系,但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发展积累了极其丰富而精辟的诗论、画论、书论、乐论、曲论、舞论、工论等,加上中国传统美学思想、文艺理论向来与传统艺术思想融会贯通、浑然一体,众多古代典籍文献成为培育中国艺术学的丰润土壤。《总目》作为古代学术和文献分类的集大成者,正是我们深入传统艺术文献以寻求资源和理论支撑的不二门径。不论是《总目》收录相关艺术原著的内容价值,还是《总目》在“艺术类”提要中涉及的艺术史、艺术文献史、鉴赏史、理论史的概括和总结,都是我们今天构建具有中国特色艺术学的直接来源。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补证。

其一,《总目》有助于厘清中国艺术学起源、形成的历史过程,揭示中国艺术的发展规律、发展路径和发展模式,可辅助完成中国艺术学的合法性论证和学科构建。《总目》对艺术文献的整理和分类正是在前代史志目录的基础上择优完成的,在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古代艺术内涵的起源及变迁、古今艺

术概念的差异性的同时,亦能从其依据的分类标准、为艺术书籍撰写的提要内容中,弄清不同时代的艺术观念和艺术态度,了解中国特有的艺术门类发展概况。如《总目》“艺术类”涵盖绘画、书法、琴谱、篆刻以及棋、射、投壶、樗蒲等少量杂技内容,大部分都是中国独有的“艺术”种类,代表着艺术发展至清代所形成的以书画为主体的艺术体系,“艺术类”小序所述内容,实际上也体现着中国传统艺术独特的发展路径,这部分的艺术文献价值前文已有探讨。

其二,《总目》强调艺术的社会政治功能,重视艺术的道德修养作用,对我们批判继承、丰富发展传统艺术学思想,构建中国艺术学话语体系具有借鉴意义。以音乐为例,中国古代文化常将“礼乐”并称,《周礼》中已有“有道者”“有德者”“乐德”之类的观念,甚至“礼”在教育中所占分量也不能和“乐”所占的分量相比。到了孔子,他不仅继承了乐教思想,更有了对于音乐的最高艺术价值的自觉,孔子对音乐的学习,是要由技术深入到技术背后的精神,更进而把握此精神所有者的具体人格。《论语》曾有“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矣”^[12]⁴⁶。“美”属于艺术的范畴,“善”属于道德的范畴,这是孔子由自己对音乐的体验得出的对音乐、对艺术的基本规定和要求,即要求艺术达到“美”与“善”的统一。这也是中国艺术追求的最高境界,道德能丰富艺术的内核,艺术亦能滋养、稳固道德的力量。《礼记·乐记》言:“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也。”^[15]可知,音乐承载的政治教化功能,实质上是激发人民自身的力量完成道德建设和人格修养,以促进社会的和谐。同样,传统绘画与书法艺术也具有此类成就道德修养、倡导美善统一的社会功能。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曰:“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16]张怀瓘《书断》曰:“昔庖羲氏画卦以立象,轩辕氏造字以设教,至于尧舜之世,则焕乎有文章。”“文章之为用,必假乎书;书之为征,期合乎道。故能发挥文者,莫近乎书。若乃思贤哲于千载,览陈迹于缣简,谋猷在觊,作事粲然。”“披封睹迹,欣如会面,又可乐也。”^[17]这都是通过阐述书画的源流脉络,把艺术具有的教化作用、审美愉悦、艺术表现组合为一个完整的艺术话语体系。

官学指导下以构建正统思想为初衷的《总目》实则强化了这一艺术体系。从文献分类开始,《总目》就以有无社会功用和雅俗之分标准,将音乐文献分别置于“经部”和“子部”,这与清统治者将儒

家礼乐的作用发展扩大有关,他们重视的是遵循礼教传统的音乐,凸显的是音乐能服务于统治者的实用价值。同时,《总目》又将有关金石、字学的书法文献置于“经部”和“史部”,强调其证经治史之功和知识教育的作用。虽然这种经世致用精神曾促使艺术成为巩固政治统治的工具而忽视了艺术的审美主体性,但是任何时代的艺术都不可能只是纯粹的艺术表现。同样,美的呈现也不能完全剥离真和善,中国当代艺术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仍应坚守德育功能、美育功能、智育功能为一体的艺术学思想,同时更要以史为鉴,批判地继承和发扬传统艺术学精神。集学术文化之大成又浓缩官学思想之精华的《总目》,无疑是对中国艺术学进行历史性重构的重要的文献资料。

注释

①学界对《四库全书总目·艺术类》的研究多集中于美术、书法、音乐等具体门类艺术,对艺术学的整体研究较少。目前相关论文有李倍雷《基于〈二十四史·艺术列传〉对〈四库全书总目·艺术类〉与〈清史稿·艺术列传〉的路径分析》和周成霖硕士论文《〈四库全书总目·子部·艺术类〉研究》,前者聚焦于《二十四史·艺术列传》的“艺术”内涵演变,后者则侧重于《总目·艺术类》的编纂内容及书目分析,未对《总目·艺术类》在当今艺术研究中的意义与价值详作探讨。②《总目》在收取书籍时,会根据其文献价值、有无违碍、是否有悖浅谬讹之言等情况分为著录和存目两类,著录之书便抄入《四库全书》,入存目之书则仅列书名和简略提要,不入《四库全书》。③如《庄子·田子方》中有“解衣盘礴”典故一则,其本是借助绘画创作诠释道家的哲学思想,但在中国绘画艺术中,亦常用“解衣盘礴”一词理解艺术家进行艺术创作时全神贯注、自由任放的精神状态。④

《寓意编》中载:“成化戊申,余馆授史氏,九月,其家火作,书画多付煨烬,惟此卷及欧、褚、赵模书数卷独存。”成化元年至成化二十三年,即乙酉至丁未,共二十三年,并无成化戊申年。

参考文献

- [1] 纪昀,陆锡熊,孙士毅.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总叙[M].北京:中华书局,1997:1191.
- [2] 纪昀,陆锡熊,孙士毅.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八[M].北京:中华书局,1997:1981.
- [3] 纪昀,陆锡熊,孙士毅.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凡例[M].北京:中华书局,1997.
- [4] 纪昀,陆锡熊,孙士毅.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十二[M].北京:中华书局,1997.
- [5] 纪昀,陆锡熊,孙士毅.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1997.
- [6] 纪昀,陆锡熊,孙士毅.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97.
- [7] 董古军.中国艺术文献学[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8:37.
- [8] 纪昀,陆锡熊,孙士毅.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五[M].北京:中华书局,1997:1128.
- [9] 纪昀,陆锡熊,孙士毅.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1997.
- [10]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6:86.
- [11] 纪昀,陆锡熊,孙士毅.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七[M].北京:中华书局,1997.
- [12]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 [13] 陈池瑜.中国艺术学论纲[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8:14.
- [14] 张道一.关于中国艺术学的建立问题[J].文艺研究,1997(4):49-56.
- [15] 阮元.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1534.
- [16]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2.
- [17] 上海书画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历代书法论文选[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154.

The Documentary Value of General Catalog of the Complete Library of Four Treasuries · Arts Sec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Art Studies Discourse System

Wang Xiyu

Abstract: The “Zi Bu (Philosophy Section) · Art Category” in *General Catalog of The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ies* is the most concentrated part recording art documents in *the General Catalog*. It consists of four subcategories: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qin tablatures, seal carving, and acrobatics. Its document collection and abstract compilation reflect the catalog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iku editors, who emphasized ancient books, practical value, and textual research value. Incorporating this category into contemporary art studies not only helps clarify the classification of art documents, understand the evolution of artistic concepts, and broaden the perspective of ancient documents in art research, but also reveals the development laws, paths, and models of Chinese art. It provides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critically inheriting and enriching traditional art studies thoughts, as well as constructing China’s art studies discourse system.

Key words: *General Catalog of the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ies · Arts Section*; Construction of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Discourse System of China’s Art Studies

责任编辑:何 参